

名家访谈

瓦当:写作是一个自我陪伴的过程

丛宜之 徐淑景 豆子怡



作家瓦当

在大多数人眼中,瓦当先生是一个工作认真负责、写作勤勤恳恳的人。在第三届贝壳儿童文学周期间,他作为主要负责人,家里、办公室、活动地点三点一线,联系、策划、组织三位一体。在如此忙碌的阶段,瓦当先生也没有放下写作,工作的时候尽职尽责,写作的时候一心一意。正所谓“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”(普希金语),瓦当先生是在普通的日子里须用写作带来一抹宁静。

兴趣是一盏灯: 痴迷写作的少年

瓦当本名刘玉诚,在鲁大文学院任教,70后小说家重要代表,著有《多情犯》《到世界上去》《古代的海》等多部长篇小说。在18岁时,瓦当就为自己起了这个笔名,少年意气风发,这种“意气”大抵是从童年就慢慢培养的。家里的老房子、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,少年抬头低头间,对于古文化的热爱日日积攒。

写作需要天赋和努力,但是人们对天赋二字的定义往往界限不清,在瓦当身上,似乎兴趣也是天赋的一种。他少年时代就喜欢书法、篆刻,在提及写作基础之时,他更是直接道出,自己从小就喜欢写东西。瓦当不止一次提到努力,他说“写作需要一定的天赋,这是先天的基础,但唯有志向和刻苦能提升自己,我的刻苦远远不够”。这后一句,恐怕不是一个作家的谦虚,更多的是一个作家发自内心的面对文学的谦卑。正是有这种谦卑、努力与天赋,瓦当才能从少时的写点“小东西”转变为真正的写作。

谦卑是对文学的态度,可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,保持内心的傲气,也是对作品的更高要求。少年人做事,总是豪情万丈,根据瓦当回忆,这个笔名曾经被一位前辈这样评价“这个笔名,哪怕是一位才高七斗的人也不敢起啊”。当时的他羞愧不已,但这未尝不是一种继续努力的动力。

瓦当最初写诗歌,后来进行小说创作,这中间的道路曲曲折折,他曾认为诗歌表达情感,迅速而有力,再到后来,他也用一部部小说传达出了属于自己的想法。

瓦当说,每个人写作之路都会经历投稿被拒的痛苦。他又说,调整心态就是再写再投,不放弃。这可能就是一个作家最初要进行的自我修炼——被否定,再继续。

台上三分钟,台下十年功。这句话也可以用于写作,一个作家的挥毫泼墨,总是笔下一字落,心中有万千。而

心中的万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?书本、名著还是生活的经验,这个问题应该是个多选题。所以瓦当离开家乡,为自己的写作寻找更为广阔的天地。

转折期: 小说让他活出了最美好的青春

米兰·昆德拉曾说:小说追求的是诗性。诗性,是一种严肃的、崇高的价值追求,贯穿于小说家创作的始终。

笔者:瓦当老师,您之前是写诗歌和随笔的,后来又写小说,您认为这几种文体创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?

瓦当:我在一篇名为《辽阔世界与散文故乡》的文章中谈到过这个问题,我借用这篇文章里的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:“任何一种文体,对应的都是一种生命形态。文体与时间、自然、信仰之间存在着神秘的同构关系。当我们从一种文体进入另一种文体,就打开了世界的另一扇门。我不想就此多说,一是因为自己也知之甚少,二是因为这个问题像世界上所有的秘密一样不愿过多敞开。我只能约略地感知,诗歌是流放所,小说是生死场,散文是大野地;诗歌是血,小说是肉,散文是心。能同时写作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的作者,其实极少。”

《漫漫无声》是瓦当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恰如小说标题《漫漫无声》,这部作品向我们展现了一种难言的幽寂,瓦当赋予了作品忧世伤生的抒情氛围,给我们带来持久的感动。“岁月漫漫,爱恨无声”,这是文章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,带给我很多感触。

谈及《漫漫无声》,瓦当回忆:“《漫漫无声》是我二十七岁时写的,发表时我快满三十岁了。三十岁对许多作家来讲,通常意味着正式上路的开始。这是我三十岁前最重要的一部作品,它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,从此我能写长篇了,而不仅仅是中短篇。对我来讲,可能这就是它的转折性意义。”

对于文学写作者来说,天赋是充满诱惑力的一个词语,对于瓦当而言,我一直好奇,是天赋还是努力来支撑他的写作之路的?瓦当坦言:“天赋几乎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天花板,而努力决定他能走多远。有的人一篇封神,有的人越写越好,有的人写着写着就不写了。我见过有坚持写的,虽然没有人家厉害,但经过慢慢地积累,已经越写越好,所以说努力也是一种天赋。”

瓦当: 用文字丈量边界,做有深度的劳动者

在第十四届万松浦文学奖颁奖典礼上,瓦当说《芝罘——米怜秘史》是他献给芝罘、献给烟台的一部书。的确,《芝罘——米怜秘史》固然是一个发明和创造出的奇观,但这个奇观也依托于芝罘实际的地理和历史,具备浓厚的现实感,小说的世界不断地从现实世界当中汲取力量,小说文本与芝罘这片土地血脉相连。

笔者:您的《芝罘——米怜秘史》继凤凰文学奖后又荣获了第十四届万松浦文学奖,但我们了解到这本书您还未出版,只是刊登了一部分在《万松浦》杂志上,您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部小说?这与您的人生经历有关系吗?

瓦当:这部书是我从生命经验向知识经验的转型之作,这是对我个人写作疆域的大大拓展,也是在写作难度上的极限挑战。如果不是偶然来到芝罘,随后又长期生活在芝罘,就不会有这部长篇小说。我像小说里的那些人物一样,作为一个异乡人来到芝罘,也因此与他们不期而遇。这种相遇激发了我“知识考古”与“灵魂推理”的癖好,也与自己长期以来对知识史的关注形成共鸣。对我来说这是一部非常有难度的书,它涉及到处理极其复杂、庞大的知识经验、历史经验、写作经验与生命经验。为了写这一本书,我读了不少于一千本书,用了整整十年才把它写完,又用了将近两年时间完成修改,电脑里保留了几十个版本的“残骸”。这本书对我个人来讲,最大的意义在于证明自己还是一个诚实的劳动者,哪怕是一个笨拙的劳动者。

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这样评价:“瓦当的《芝罘——米怜秘史》是一次叙事冒险,也是一种新的小说家言。以言不凿空的方式书写仿真历史,以正大森然的口气讲述荒诞故事,考据、夹注、互文、汇编这些学术杂语,与传记、回忆、行状、书信等叙事文本融为一体,瓦当试图以反小说的方式重新测度小说的边界,并在一种博学、繁复的叙事美学中探求语言自我绵延的愉悦。‘芝罘’是一个地名,也是一个文化隐喻,‘米怜’实有其人,而又如同一团心气;一个人物里潜藏着许多人物,一部书里隐含着许多部书,瓦当在致敬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的同时,也在怀疑、颠覆中贯注着他精深的历史关怀与文化忧思。”

瓦当的研究生郭道鹏这样形容瓦当和他的作品:“瓦当老师是一个耐得住性子打磨精品的艺术家,这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实在难得。作为一个资深出版人和作家,瓦当老师以十年功力创造出的作品是不同凡响的。《芝罘——米怜秘史》融入了不计其数的知识、文献、书籍。它的写作和阅读都是有难度的,难度是艺术的宝贵品质。”

笔者:《芝罘——米怜秘史》是您对烟台的记录与思考,富有后现代主义色彩,您之前的作品《到世界上去》也颇具这样的特征。您把历史和未来交织在一起,在继承中开拓创新,您怎样看待文学创新与继承传统之间的关系?

瓦当:没有传统的创新行之不远,没有创新的传统死路一条。创新必须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,而传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,一直在吐故纳新。事实上,只有真正的创新才能被传统接纳,成为未来传统的一部分。

笔者:5G登场,万物互联,人工智能快速迭代,ChatGPT写作成为热门话题,有人已开始运用AI进行写作,还有网络文学的存在,作为传统写作作家,您是如何看待这些现象的?

瓦当:文学式微甚或文学已死的说法已经喊了几十年,每次技术的更新迭代都带来“狼来了”的呼声,不过有人说,这次是真的狼来了。对于传统写作与AI写作的博弈,老实说,“狼来了”我也没办法。我不是马斯克,我无从判断。我还是放我的羊。至于网络文学,老实说,我是没有看法的。这丝毫没有贬低和排斥的意思。

坊间名人

于大卫的 宣讲情

任春铭

于大卫是干啥的?三言两语说不清。年轻时候,他站上三尺讲台,像扎根沃土,育一方桃李芬芳。后来当上了教育督导,助力一个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。再后来,就是2002年,他从钟爱的教育战线上退了下来。他是闲不住的人,他想难道自己就这样闲在家里虚度余生?

于是,于大卫主动找到地方党组织,自荐当起了党的政策理论义务宣讲员,成为芝罘区东山街道老干部宣讲团的一员。他走进机关部队学校、深入社区企业乡村宣讲,明眼人一下子就看出了他不俗的政策理论功底,并被他慷慨激昂的演讲所打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许多离退休干部党员自愿“投奔”于大卫,跟随他加入宣讲队伍。在他的带领下,宣讲团发展成为一支有70多位离退休干部党员参与的团队,从群众中来,到群众中去,影响越来越大。2021年,中共芝罘区委老干部局红湾银帆志愿者联盟吸收这支队伍为“红色宣讲联盟”。

于大卫这一干,就是21年。他撰写的宣讲手稿,敝帚自珍,都珍藏着,摞起来有1米高;使用的U盘有10多个。宣讲团结合国情社情民情,将声音传播到了天山雪域、大江南北,通过红色传统教育,助力党的基因在青年一代繁衍生息。

接任“团长”后,于大卫将全部宣讲员划分为14个工作组,每组5名宣讲骨干,各自都有详实的主题课件和宣讲方案。根据不同时间节点,配合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,宣讲团以基层社区、部队学校、机关企业为阵地,以党建传统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创新理论、党史国史教育、军队国防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以及国际国内经济“双循环”为主要宣讲内容,着重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培养。

21年宣讲路,于大卫走得坚定踏实:带领团队累计宣讲1000多场次,受教育面达200多万人次!党员干部从中汲取了营养,普通群众和青年人从中受到了教育……

“只要还活着,我会一直宣讲下去!”于大卫用一句朴素的话,袒露出自己的一颗红心。